调结构要高度重视民间资本作用

王 勇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同时,国家发改委“新36条”也即将出台。笔者认为,这些政策很及时,因为,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就是要让民间投资走在第一线。

今年结构调整面临新挑战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从前四年的执行情况看,用于判断经济结构调整的若干个预期性指标中有一些还存在一定的困难。譬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09年末只达到42.6%,离预期目标43.3%还有差距。而用于反映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比重,2009年达到1.62%,低于“十一五”规划中2%的目标。那么,服务业附加值占比较低,表明投资和出口仍然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研发收入占GDP比重迟迟难以增加,则意味着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要素投入,经济增长效益提高不明显。还有,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局面没能得到很好调整。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刻不容缓,而今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将从以下三个层面开展工作:第一个层面是经济结构转变应将经济增长由投资性拉动向扩大内需转变;第二个层面是经济结构转变应由传统产业向新兴战略性产业和低碳产业转变;第三个层面是经济结构转变应由全面刺激向区域经济刺激转变。就是通过十一个区域振兴规划的批准和实施,重点支持新区域经济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民间投资在调结构中大有可为

过往民间资本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经济增长方面。目前的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65%。二是在就业方面,民间投资成为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其就业量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0%的左右,至2009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1亿多,实际的从业人员超过2亿人。三是在自主创业方面,近几年来我国自主创新的70%,国内发明专利的65%和新产品的80%来自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85%以上是民间投资。我国民间投资企业目前已经分布在53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民营企业占70%以上。

在今年这场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战中,无论是传统产业要从“去库存”到“去产能”;新兴经济要有序抢占“后危机时代”竞争制高点;消费驱动要从“收入增长”到“消费挖潜”;节能减排要从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到减排达标等等,民间投资都大有用武之地。那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今年要逐步让位。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主要还是应依靠民营经济的力量,这样才能可持续和具有后劲。

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着力点

首先,应密切把握民间投资的特点。民间投资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地区性发展又不均衡。还有,民间投资多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技术性不强的一般性竞争行业,具有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的特点。另外,在资金来源上,具有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积累的特点。立足于上述特点,政策才能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政策支持面要能广覆盖。这次的新36条的内容将更加细化,覆盖面会大大拓宽,如可能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进入部分铁路支线、干线建设等。同时还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福利事业。

再次,建立健全适宜的民间投资服务政策体系。建议新36条颁布后,随后央行和银监会将要制定的相关金融政策、财政部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工信部制定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等都能紧贴民间投资需求,将内容进一步细化,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扫清拓宽民间投资道路上的障碍。还要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通过加强政策指导,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

经济时评

吉利收购沃尔沃 仅仅迈出第一步

李季先

北京时间3月28日晚9点,吉利正式与福特签约,以18亿美元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吉利收购沃尔沃是国内汽车企业首次完全收购一家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全球性著名汽车品牌,并首次实现了一家中国企业对一家外国企业的全股权收购、全品牌收购和全体系收购。

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体系、品牌和股权的完全性决定了其不同于此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如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而是带有明显的制度双向植入性。如果考虑到跨国并购在法律文化差异、劳工文化差异等问题,从长远看,吉利本次大手笔收购沃尔沃只是迈开了其万里征途中的第一步。

美国、日本等跨国并购强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跨国并购都是建立在对自己和对被并购对象及其所在国法律文化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一项海外并购,尤其是全品牌股权投资能否成功,除了取决于投资双方的商业义务承受能力、技术和环保状况、市场营销及机会把握能力等因素外,还要取决于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资方和劳工方,有时候还包括管理层方面的整体情感文化投入和充分的法律投入,比如,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如何争取到公司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的倾力支持和相关并购框架协议的固化、薪酬体系的内外接轨等,而这正是我们当下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国资本海外并购的短板。

吉利收购沃尔沃眼下的成功,并不代表以“信息不透明,缺少适当的海外并购公关策略,对购并对手和购并目标的商业运作模式和企业文化缺乏了解和持续跟踪,一味追求股权收购表面价格的便宜(没有考虑劳工安置费等额外费用支出)”为代表的过往并购案例中的经验教训已经过时。遇问题时对外交或政治磋商过分依赖、过于强调经济利益上投资双方的双赢而忽视对被投资对象所在国选举生态等政治生态的关注等,依然是包括吉利在内的个别中国民营资本在出行海外时最易犯的错误,进而使得中国民营资本此前的海外并购之路并不平坦,甚至荆棘密布,海外投资的学费交了不少,可鲜有海外投资斩获甚丰者,甚至连联想也不例外。

事实上,涉外投资尤其是政治敏感领域的投资、全品牌投资、全体系投资,需要的不仅是并购资本和有竞争力的员工薪酬,还需要投资智慧。要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要充分认识到海外企业实业是一个不同于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不一样的世界,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投资战略和投资战术。只有这样,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路才能渐行渐近并渐入佳境。对于吉利当下来说,要特别做好目标公司管理层及劳工公关和媒体大众公关,“得民心者得天下”,用在海外投资时也是适用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律师、财务顾问等专业人士的力量签署好约束力较强的并购框架协议及一揽子并购保障协议安排,以避免本来投资双方共赢的全体系、全品牌收购或全股权并购沦为竹篮打水一场空或外国政府或媒体眼里的“投资负担”,并演变成另一个类似于此前“上汽收购双龙汽车”般的收购黑洞。

(作者为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焦点评论

赔 偿

财经漫画

李向东/图

有此一说

控制炒房要跳出物业税思路

陈东海

房屋价格最近还在涨。“两会”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是北京产生了几个新“地王”,并导致新地王周围的二手房纷纷大幅度提高报价。由于北京独特的影响,分析认为,北京新地王可能导致2010年北京和全国的房屋价格再次强烈上涨。

果不其然。最近有两则房屋价格上涨或者蠢蠢欲动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一则是3月23日的报道,说是根据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统计,截至3月20日,北京市二手房住宅网签总量较2月同期相比其涨幅高达145.60%;3月中旬二手房市场的整体交易均价较上旬上浮了3.44%,而与上月同期相比则出现了16.35%的明显拉升。另一则是上海的消息。据报道,在上海二手楼市年前5%~10%的向下议价空间不断收窄,甚至在一些板块已经消失,微涨之风骤起。

3月是一个关键的时点。笔者记得,2009年上海的房屋价格就是在3月中旬见底,而后开始上涨,并且上涨速度逐渐加快的。在各方的强烈声讨和政策密集出台的情况下,年后全国房价一度出现成交量大幅缩小、价格微幅下跌的局面。今年3月后房屋价格可能又重复2009年的故事。但是,由于现在能够出台的控制房屋价格的手段基本上出的差不多了,如果3月后房屋价格再逐月上涨,“开征物业税”当作控制房屋价格的救命稻草的呼声又会高起来。

其实,已经有不少理性的分析指出,由于中国商品房不享有永久产权,而且已经缴纳了高额土地出让金,所以再对商品房持有者征收物业税,属于双重征税。同时,海外开征了物业税的国家很多,但是物业税也没有抑制这些国家多年来的房屋价格逐渐上涨,因此物业税可以控制房屋价格的说法,只是一个臆想而已。另外,中国的房屋成本构成差异很大,商品房基本上都缴纳过土地出让金,但是中国还有大量的福利房等各种性质的房子,这些房子并未真正缴纳过土地出让金。所以不问房子的性质,一概征收物业税,对于商品房的拥有者非常不公平,等于是在扩大社会的不公正。再者,支持物业税的理由是为了控制炒房、打击炒房,但是物业税如果真的开征后,却针对着所有的房屋拥有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和家庭是并不炒房的,但是却被炒房者所累,连带交了不该交的税。所以,为了抑制少部分炒房者而对全民都征税,是巨大的不公正。

因此,企图通过物业税来控制房价和炒房,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跳出用物业税来控制房价和炒房的思维桎梏。那么,按照抑制炒房从而部分控制房屋价格的思路,只需要出台针对炒房的政策就可以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入手,一是控制针对炒房的信贷,二是出台抑制炒房的特别税收。

在采用这两个措施以前,必须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炒房。由于继承和拆迁的原因,以及家庭人口和迁移的因素,一个家庭在同一城市拥有二三套房子可能是正常的。超出这个界限,可能就是炒房的。笔者见过的一个炒房者,其家庭在同一城市拥有五套以上的房子,在其他城市也拥有多套房子。所以,笔者觉得,大致可以把同一家庭在同一城市拥有三套以上,或者是在全国拥有五套以上的房产,再购买新的房产的,可以界定为炒房,从而对这种行为进行抑制。

那么,界定了炒房行为以后,首先是从信贷上控制炒房行为。对于超标的购房者,必须绝对禁止银行再为其发放新贷款。不能用全体老百姓的钱来给炒房者制造财富泡沫,扩大贫富差距。也就是说,绝对不允许用老百姓的存款来给炒房者提供资金。如果有这个信贷控制措施,炒房行为将被抑制绝大部分。

其次,对于炒房行为征收特别投资税,以引导投资方向。假如,对于同一家庭在同一城市有超出三套或者全国超出五套以上的房产,再新购买房产的,将对新购置的房产征收房屋成交价格100%甚至以上的税收,那么基本上可以让炒房者绝迹。当然,对于炒房行为征收的税收,不能作为公用财政被花掉,必须把这部分资金全部给予中低收入者做房屋补贴和建设廉租房上。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就可以有效地杜绝炒房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助涨房价的动能。更重要的是,这个办法不会殃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炒房的居民和家庭,所以值得讨论。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

缘木求鱼

消灭“笼中虎”的那个英雄

木 木

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开始进入中国居民家庭。北京的电视机品牌主要是昆仑、牡丹,9寸的黑白电视,价钱100多元,而且还要凭票购买。当时月工资在三四十元钱左右的就算不错的收入了,但那时候的家庭,一般负担都比较重,上有老、下有小的,要攒下一台电视的钱,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

虽然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执著追求(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狂热追求),实实在在地掏空了许多家庭的多年积蓄,但“被掏空”后,好像绝望并没有接踵而至。电视机为这些家庭及其邻居们,展开一幅与以往不同的画卷,并进而激发出更大的新的希望。人们似乎更有干劲儿了。当然了,国家也从这种“追求”中受益匪浅——回笼了大量的宝贵资金,接着去干更大的事情去了。

再后来,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装电话”了。装电话不是件容易事儿,除了要先缴上5000元左右的初装费,而且还要托关系、找路子、搭人情。彼时,大家的月收入也不过区区一两百元,为了这部能“倒钢材”方便点儿的电话机,许多家庭的“财富”又被掏空了。当然,国家又回笼了巨量的宝贵资金,去干更大的事情去了。随后电信行业的超高速发展,也间接印证,这些资金确实被干了大事。

几乎与装电话同时撩拨人心的当属“攒电脑”了。本人印象至为深刻(刻骨铭心般)的是,大概1995年前后,花费1.5万元左右,攒了一台在当时数“最高配置”的486电脑。虽然现在想起来,花大价钱买回来一台高级电子打字机,实在有点冤大头,但当时的感觉应该还是相当的好,毕竟别人问起来,也可以底气十足地说“我会电脑”了。

不过,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购买电脑、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乃至一部分“先富者”购买汽车以后,大概没有人再有被“掏空”的感觉了。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购买的所谓“大件儿”,却几乎无一没有冤大头的感受。

汽车进入家庭渐成气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事情。那时候的车型还是以捷达、桑塔纳为主。其实,要提到私人汽车的“开拓者”,就不能不提一下小“126P”,或者小P——北京人的叫法,大名菲亚特马鲁赫。本人有朋友曾在亚都公司就职,他说,当年何鲁敏就曾看着停在公司楼下的几辆小P大发感慨:什么时候,这院子里能停满了126P,那一片,那感觉……简直没的说了!大意如此吧。

这样的感觉,大概时至今日,何鲁敏也没体会到。中国从小P跨越到小捷、小桑,几乎是一夜间的事。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买汽车还是怎么想怎么冤。都是直接引进的生产线,用不着研发投入,人工也极便宜,但十几、二十万的卖价,却毫不妥协——你爱买不买!“先富者”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汽车行业的腰包。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要诀吧。你看,十几年下来,汽车行业壮大成何许状态,甚至连后来的吉利都开始收购沃尔沃了呢!

虽然难免冤大头的感觉,但经济学家说,供需决定价格,供应的有限和需求的无限,决定了价格的坚挺。这也似乎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于是,这理论纯熟于心、娴熟于手,便被发扬光大于各个领域。中国老百姓的辛苦钱,也就随之一次次地被集中起来干大事去了。那只曾经异常可怕的笼中虎,也就一次次地被点化为驯良、可爱的小猫咪,发展到最后,小猫咪就像被施了魔法,似乎再也变不回去了。

当然,能赢得这枚终极英雄勋章的似乎非房地产莫属了。房地产行业就是居民储蓄这只“笼中虎”的终极克星——武松。无论这只老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有多么的不可一世,但在武松面前,它都只能是一只小小猫儿罢了。“武松”的终极性在于,他只几拳就把许多人、许多家庭打翻在地,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得不忍受“被踏上一万只脚”的人生体验;“被掏空”、“冤大头”的双重感觉可能成为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群体的标志性感受。

虽然专家们都说,买房不过是把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而且随着所拥有房产的增值,家庭财富也水涨船高。但对普通购房者而言,这种财富的倍增毫无意义。如果硬要说其还有所谓的“财富效应”的话,也不过仅仅是使已购房者多了些许庆幸和后怕、使未购房者多了些许后悔和痛恨罢了。与普通购房者不同,飞涨的房价对房产投资者而言,意义就大不一般。

席卷全国的这次房地产热潮,大概肇始于2002-03年。那个时候,北京四环附近的商品房,每平方米亦不过4000元左右,位置再好一些的,每平米六七千元撑死了。但随着需求莫名其妙地迅速扩大,房价也扶摇直上九万里,到现在,连通州、昌平这种老北京眼里的“蛮荒之地”,都有超过每平米两万的公寓楼了。虽然投资者欢欣鼓舞,许多人还因此实现了现代人孜孜以求的所谓财务自由,但站在一个更高的层级看,投资者的财富必须借助于古老的“交换”才能得以最终实现,而那个终极投资者的后面,必须站着一个实实在在的需求。

在房价暴涨的背景下,这个“真实的需求”便难免尴尬起来:如果就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巨无霸量级的真实需求,那么此前的所有故事便可统统归类于神话范畴;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巨无霸量级的真实需求并被迫高位接盘,那么,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饕餮盛宴的上空将被愁云惨雾所笼罩。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从这个意义上讲,房产投资者与普通购房者相比,又确实很难分出孰高孰低、谁优谁劣,不过是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罢了。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泰坦尼克号最后还是剩了一些幸运儿的,虽然数量极少,但这种“乾坤大挪移”法术的最终受益者们,就难免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官员手捧嘴含的至宝,并被屡屡祭出,以为举世楷模。但一切事物走到极致,就难免开始反向的转化。在民智渐开的今天,一些简单的说辞似乎已难堵众口,而且从历史经验看,凡是某些人想集中力量办好的什么事情,大多都最终只能从中蹦出一些跳蚤来。